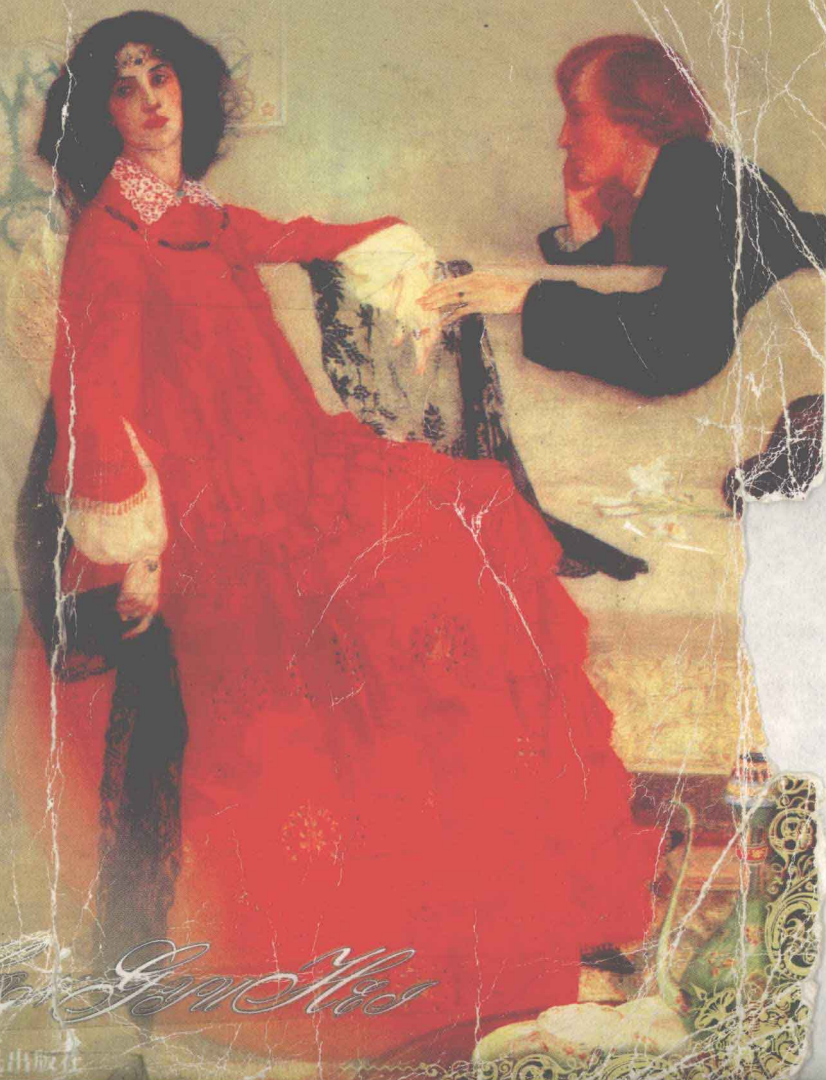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 与 黑

[法]司丹达尔 著
刘志威 译

(陕)新登字 001 号

I565.44
55

红与黑

[法]司丹达尔 著

刘志威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华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434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4252-8/I·949

定价:13.00 元

· 总 序 ·

从上高小时，我就有读长篇小说的嗜好。长篇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绘声绘影，引人入胜。一本书常常读得废寝忘食，不读完不肯放手，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我却无怨无悔。开始主要是读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稍后便接触到世界名著。当时几乎是不加选择，凡是能借到手的，便尽兴去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大约到高中时，我便读完了《茶花女》、《古丽雅的道路》、《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利场》等。尤其是泰戈尔的《沉船》，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印象，男女主人公那传奇般的经历、细腻的感情世界以及作品诗一样的意境，打动着好奇心。我读着读着，忘记了烦恼，忘记了家人，忘记了学校，好像进入了一处无边无际的宝地。

考入外语学院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在高大的书架中徘徊，我在无涯的书海中遨游。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华书店里重又出现了《十字军骑士》、《基督山恩仇记》、《十日谈》时，我一古脑儿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把它们买回，珍藏起来，真是比得了宝还高兴。尤其没有想到的是，年届不惑之时，竟然投身出版业，干起出书这行当，可谓“歪打正着”吧！

而今已年过半百，从事出版工作也有了十几个年头，虽然不像作家那样著作等身，但自己偶尔舞文弄墨，年深日久，竟然也出版了十多部书，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闲时回味起来，才觉得自己从名著中受益匪浅，既增长了知识，也学会了主要的写作方法，它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对自己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助。正因为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才想在序里把自己得益于中外名著的心得告诉大家，以便更多的人受惠。

文学是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而文学大师所提供的经典作品，则反映的是浓缩了的社会，描写的是典型化了的典型人物，是人生的百科全书。每个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喜欢文艺作品的初学者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得到借鉴。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创作的大型丛书《人间喜剧》，就是试图反映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原计划写一百四十三部小说，后来实际完成了九十六部。他自己把这部关于社会风情的大型丛书分为六个场景，每个场景中都有精湛的代表作。如个人生活场景中的《夏倍上校》、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欧也妮·葛朗台》、巴黎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乡村生活场景中的《乡下医生》、政治生活场景中的《舒安党人》等。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那辛辣的笔触、无声的幽默、出神入化的讽刺、炉火纯青的语言，总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观念的升华、文化的熏陶、情操的陶冶、知识的更新、历史的沉思。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完美的艺术享受。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道，他是一个“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文学反映社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如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全书共写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1805—1820），它不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俄法战争的历史画卷吗？作家以如椽之笔，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伟人和那场令人痛恨的战争。它既是小说，又是历史，如写保罗吉诺会战，就像作者身临其境一般。类似这种题材的名著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不少当代读者，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小说中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以及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也是小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座宝库，世界名著则是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遗产，继承这些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促进我国古老文明在新形势下革故鼎新，使其更具朝气，更有活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和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

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国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广泛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才能发展和丰富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学。下面，我想就自己见闻所及，粗略地介绍一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有些则只提及书名，就算是我向大家推荐的一份书单吧！

说起世界优秀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享誉世界的欧洲最古老的文学——古希腊文学。其主要作品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都是以发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的特洛伊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史诗描写希腊人用了三十年的工夫，竭尽全民族的力量，才用木马计攻下了特洛伊。在史诗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爱神、海神、战神、日月之神、智慧之神都已出现。这些人格化了的神和神化了的人是时代的产物，并予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上，在各国交往中，如果连希腊诸神都一无所知的话，是会显得愚不可及的。文学起源于神话，这大概是被中外各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希腊神话中令人难忘的伟大英雄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泥土和河水创造了人类，又用茴香管把天火盗至人间，使人间出现了光明。他被天神宙斯用链子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让贪婪的鹰啄食他的肝脏，但他永不屈服，永不低头，永不后悔。马克思曾说过：“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史上最高贵的圣者和殉教者。”大文豪高尔基评价说：“普罗米修斯是人类世界上最被爱好的不朽形象之一。”这样不朽的艺术形象多少年来一直在欧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稍微懂得点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他的英名。

再如欧洲中世纪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但丁的《神曲》，它是中世纪各种学术发展的综合产物，又是近代文化的序曲。它一面攻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和残酷剥削，又一面鼓吹人们苦苦修炼，争取到达天国乐园。作为作家，但丁具有两重性，但他爱国家、爱民族，以及对天主教的痛斥和对社会上形形色色不道德行为的批判，都体现了人民性。伟大导师恩格斯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

曲》吹响了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同时又反映出近代思想的萌芽，它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导，对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一个伟大的改革运动。恩格斯曾说：“这是一个需要和产生思考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说到文艺复兴，人们便想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油画，其实，不仅在绘画，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巨人和巨著，其中，首推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反封建、反教会、反僧侣的旷世奇书，如一把匕首，刺向那反动封建的社会，似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他如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更有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奥赛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4
值得一提的还有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矛头指向封建贵族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并且更为彻底。它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文艺复兴时期宣扬的人道主义提高到政治性原则的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佳作，如英国但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被誉为“第一本真正称得起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至今仍得到全世界青少年的喜爱。此外，英国小说家撒木尔·理查生的两部长篇《巴美娜》和《克拉丽莎·哈娄》，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法国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哲学小说《小大人》，德尼·狄德罗的《修女》、《拉摩的侄儿》，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依丝》，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都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些小说和后世长篇小说相比虽稍嫌稚嫩，哲学或议论味道较浓，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世界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十九世纪是各国长篇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和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欧洲诸国与俄国更为突出，举世公认的不少名著均产生在这一时期。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

夫人》，司丹达尔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勃朗特姊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俄国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真是色彩纷呈，诸家并出，各种流派的作品美不胜收。美国毕采·师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名《黑奴吁天录》），深刻揭露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歧视，描写了黑奴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鞭挞了农场主惨无人道的野蛮罪行，在当时反响强烈，对废奴运动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美国文学起步虽晚，但一开始就向现实主义过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长篇小说的创作也更加成熟，更具有活力，出现了不少史诗般的作品。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国莫泊桑的《俊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国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战争与和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高尔基的《母亲》，美国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以及德莱塞的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坦噶》和《天才》等。

书海茫茫，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尤其是近现代的一些世界名著。如《老人与海》、《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飘》等，已是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的了。在劝大家读世界名著的时候，我也不赞成大家再像我当时那样不加分析、随心所欲地去乱读一气，而是要有一定目的，有一定的选择。尤其是欧美文学，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度，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烙印，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充斥书中，我们必然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条分缕析，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书中的人和事，要抛弃资产阶级的糟粕，以便保留各国民族文化中的珍品，切不可囫圇吞枣，全盘接受，这是我们在读外国世界名著时应该遵循的方针。

我社在出版这套世界名著时，精心地做了选择，一是尽量照顾到世界各国，以保证其广泛性；二是非精品不选，不搞滥竽充数，坚持

质量第一。在译本的选择上，择善而从，一律用原版文字翻成汉语，不摘从其他语种转译，以便尽量接近原貌。译文均以现代白话文为准，译者均是国内各方面的名家。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套书是为青年人编选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踏进这崇高的文学殿堂，去领略名著的魅力，去丰富自身的阅历，去积累宝贵的经验，去创造明日的辉煌。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我相信这套世界名著译丛一定会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成才，新的文学巨匠会在他们之中产生，让这套丛书托起更多明天的希望，去造就祖国的栋梁。

如果读者对选目和译文的质量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我们将不断地改正缺点和不足，使这套丛书臻于完善。

周鹏飞

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于西安·逍遥斋

·译 本 序·

《红与黑》自一八三〇年问世以来，经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考验，已被世界各国目为经典文学名著，同样也受到中国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欢迎，成为他们爱不释手的一本文学读物。

一、《红与黑》的创作过程

人们或许很难相信，他们如此喜爱的这部小说，竟是作者在当时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出来的。但这确是事实。

司丹达尔曾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手稿的空白处写道：“只要我还需要对作品内容费心思索，我就无法赋予人物对话以个性和深刻含义。因此，以于连·索雷尔这样的现成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司丹达尔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信徒，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拥护者，拿破仑的忠实崇拜者。一七九七年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乡格勒诺布尔，来到巴黎，追随拿破仑转战欧洲，去过意大利的米兰、德国的柏林、俄国的莫斯科，参加过拿破仑对欧洲君主国第六次反法联盟的抗击，直至拿破仑垮台。他把拿破仑的失败视为最大的历史悲剧，借于连之口表达了他的失望心情：“拿破仑真是上帝给法国青年送来的人！谁能取代他？没有他，不幸的人们能做什么呢？”

正因为如此，司丹达尔对波旁复辟王朝怀有深刻仇恨，他曾说过：“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有别的。”于是他前往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旅居了七年，这期间他称波旁王朝是“发臭的烂泥”，发誓说“不再见被波旁王朝玷污的法国和巴黎”。意大利烧炭党人的一八二一年起义惨遭镇压后，

他被警察当局视为“不信宗教、反对正统和一切合法政府”的“极端危险”的人，被迫返回巴黎。

从这时起，司丹达尔更注意用其敏锐目光，观察复辟王朝统治下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矛盾斗争，以数学家般的冷静头脑，分析和概括时代的本质特征，试图揭示出复辟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反动统治和种种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革命到了一触即发的成熟阶段。这时，一八二七年十二月《法院公报》报道的一桩刑事案件，引起他密切注意，他从中看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特征，从而涌动着强烈的创作激情。随后，他利用多年练就的成熟艺术技巧（司丹达尔创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七岁，此前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艺术传记和中篇小说《阿尔芒斯》），对这一素材进行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形象塑造，创作出了《红与黑》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2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案件作一概要介绍，以便使读者看出案件主人公安托万·贝尔德和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相似之处。

安托万·贝尔德时年二十五年，出生在布朗格村一个穷苦的马掌匠家庭。他身体孱弱，不宜从事笨重劳动；但他天资聪颖，很小就对高深的学习表现出浓厚兴趣。当地几个有身份的人，出于强烈但缺乏明智的同情心，想帮他步入教门，以摆脱命运为他安排的卑微处境；当地的本堂神父收养了他，传授他一些基本文化知识，并帮助他于一八一八年进入格勒诺布尔小修道院。一八二二年，他因重病被迫中断学业。本堂神父后来又介绍他去米肖先生家任家庭教师。米肖夫人三十六岁，她贞洁端庄，心地善良，对其体弱的家庭教师非常关心，丝毫没有考虑这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不到一年时间，米肖先生不得不把他辞退，因为传说他与女主人发生了恋情。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是担任圣职，于是想重入教门，向里昂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修道院提出申请，但均遭拒绝。他把失败归罪于米肖夫妇，在给米肖夫人的信中扬言要杀了她。他七月十五日去里昂买了手枪，二十二日（星期天）一大早，带着装有两发子弹的手枪，进入布朗格村教堂，趁米肖夫人虔诚祈祷之机，向她和自已各开一枪，两人均重伤倒地。

司丹达尔还注意到当时发生的另一桩类似的刑事案件：青年细木

工拉法格杀死了他出身高贵的情妇；并把他的某些相貌特征赋予了于连。

司丹达尔将贝尔德和拉法格的命运作了比较，进而就“人的性格力量和毅力”进行了深入认真的思考。他一直在寻找像中世纪的骑士那样激情澎湃、骁勇无畏的英雄，他现在于下层百姓中找到了他们。他在《罗马漫步》中清楚无误地写道：“在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已丧失强烈而持久的感受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像拉法格这样的青年中间，激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缺乏财富，他们不得不工作，同其真正的需要搏斗……他们保留着意志的力量，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感受力。伟人今后很可能出于拉法格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从前也曾处于同样的状况：良好的教育，丰富的想象和极端的贫困。”

《红与黑》的创作始于一八二八年底，完成于一八三〇年。对司丹达尔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创作时期，他本人就曾说过：“在我一八三〇年写作《红与黑》的时候，说我已变得非常幸福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说我那时颇为幸福。”他所以幸福，可能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他切齿痛恨的复辟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二、一幅时代画卷，一代青年的悲剧

司丹达尔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文学应当反映时代，说“文学就是社会的表现”，还把文艺作品比做“一面镜子”。他在解释《红与黑》的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时曾明确指出：“作者所要描写的，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即是说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身体力行，忠实执行其文学原则，自觉地为当代社会谱写历史。

《红与黑》通过对青年于连同社会的尖锐冲突，他的孤军奋战，他一步步了解并认识表面光彩夺目，实则黑暗荒谬的社会结构，直到幻想最终破灭，惨遭杀害的全过程描写，形象而生动地勾画出复辟时期的社会风貌，揭示出一代青年的悲剧，预告了复辟王朝必然灭亡的

命运。

于连这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是在拿破仑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狂热崇拜拿破仑，因为他给法国赢得了荣耀，给出身卑微的青年树立了飞黄腾达、出人头的榜样。正如法国作家维尼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所描绘的那样：“老师不停地给我们念（拿破仑）大军的战报，我们的‘皇帝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了有关塔西陀^①和柏拉图^②的教学，我们的家庭教师像是部队的传令官，我们的教室如同一座座兵营。”正当这一代青年走出校门，怀着满腔热情和宏伟志向，准备在史诗般的斗争中大显身手，创建自己光辉灿烂的前程时，突然噩耗传来：拿破仑垮台，国家被外国军队占领，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在复辟的旧制度下，贵族和宗教的黑暗统治，老人政治的专横跋扈，出身的卑微和金钱的缺乏，这一切向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关闭了所有通往成功道路的大门，压抑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只能终日无所事事，虚度年华，遭人欺压和睥睨，从事最低下的职业，勉强度日，空有“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想象”，却生不逢时，无用武之地，不能迅速赢得荣耀和财富，摆脱“极度的贫困”。“所有年轻人的心里都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苦恼”。于连这样感叹道：“换了二十年前，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要么战死疆场，要么三十六岁就能当上将军。”可以说，这是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共同心声，道出了时代给他们造成的悲剧。

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法国著名作家缪塞曾这样写道：“孩子们谈起荣耀，人们对他们说：‘那你就去当神父’；他们谈起抱负，人们对他们说：‘那你就去当神父’；他们谈起希望、爱情、力量和生活，人们对他们说：‘那你就去当神父！’”简言之，社会不给青年一代提供任何通过伟大行动显身扬名的机会，如果他们出身卑微，就只能去当神父，像贝藏松神学院的几百名学生那样；不然就像富凯那样隐居深山，靠劳动去挣一点小钱度日，或像吉罗尼莫那样漂泊流浪，或像于连初时那样，给人当

① 塔西陀（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② 柏拉图（前428—前348）：古希腊哲学家。

家庭教师，或像他后来那样，卖身投靠当权者，死心塌地为他们效力。统治者只承认贵族头衔和金钱的价值，拒绝任何新思想，把生机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资产阶级青年一代排斥于政治生活以外；一八三〇年十月三十日《辩论报》上的一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代青年的悲剧：“他们在失宠中长大，在流亡中成熟。”

复辟王朝所以排斥他们，原因很简单：当权者把他们视为对其反动统治的威胁，畏惧被他们重新卷入革命洪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德·雷纳尔夫人所以对于连的某些话感到震惊，就是“因为她那个圈子的人总是说，特别是有了这样一群受过极好的教育，出身卑微的年轻人，罗伯斯庇尔的重新出现才有可能”。诺贝尔伯爵在警告其妹玛蒂尔德时也是这样说过：“你要小心这个精力无比充沛的年轻人（于连——译者），要是重新爆发革命，他会把我们全都送上断头台。”

青年一代的悲剧是波旁复辟王朝一手造成的。为了形象地深化这一主题，司丹达尔精心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外省小城维里耶尔，弗朗什—孔泰省省城贝藏松，法国京城巴黎）作为主人公于连的活动天地，透过于连的眼睛，描绘出一幅立体的法国社会图景。

5

于连的家乡——小城维里耶尔是复辟时期外省城市政治形势和道德氛围的典型代表，这里实行的是地道的贵族和教会的专制统治。贵族阶级的代表——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一心想彻底恢复革命前的封建旧制度，最担心资产阶级再次夺去他们手中的权力。他曾哀叹道：“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城市里，工业兴旺发达，自由党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渴望掌握政权，会把一切变成他们的武器。”为了维护其权力和地位，他拼命扼杀一切高贵和有新意的思想，市府对树木的“定期砍伐”和“无情摧残”就是很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他积极组织仪仗队，动员全城居民欢迎国王驾临，就是为了让复辟王朝为自己撑腰打气。他竭力安排自己人当第一副市长，把一个工业家挤下去；他疯狂惩罚阅读《立宪报》的人，发誓要将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赶下台。但资产阶级自由党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经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和拿破仑的帝国统治之后，他们不甘心权力重新把持在曾被他们推翻的旧贵族手里，去做他们的顺民。于是他们办报纸，造舆论，宣传自由和平等，积极竞选第一副市长，在仪仗队人选问题上向市府发难，同贵族

展开激烈斗争。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上蹿下跳，四处活动，“最后竟动摇了市长在教会当局的威望”，终于取代德·雷纳尔当上市长，而后再爬上某省省长的宝座。这既表现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斗争，又表明司丹达尔已经清楚地看出，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取代保守没落的封建贵族，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6
司丹达尔还用许多真实的细节，向我们揭露了套在外省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宗教统治的阴森可怖。天主教的特务组织——耶稣会的圣会在外省拥有严密的组织，它的阴谋活动贯穿于《红与黑》的始终。它派玛斯隆来维里耶尔监视冉森派的谢朗神父，并最终取而代之；它命令仆人监视其主人的活动，它召集秘密会议，写匿名信，制造对流言飞语的恐惧，甚至连人读什么书也逃不过它的眼睛。它用教育和忏悔两种手段，从精神上控制妇女：“德·雷纳尔夫人是由那些狂热崇拜‘耶稣圣心’，对与耶稣会为敌的法国人怀有强烈仇恨的修女们教养成人的”；那封导致于连最终不幸的揭发信，就是由德·雷纳尔夫人的忏悔神父拟定，而后逼她抄写的。对于男人，圣会则逼迫他们为其捐款，并公开登记捐款金额。德·雷纳尔先生几次都捐款最少，便得罪了圣会，这也是他被撵下台的原因之一。外省一个“不信教的人”，因为没有向教会捐款，“那些神父和贵族就把他赶了出来”。小说结束时，圣会排挤了所有冉森派对手，在各地都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建起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精神统治。

司丹达尔还生动地描绘了拜金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它对人性的腐蚀。他指出“带来收入”在维里耶尔是“决定一切的名言。单是这话，就代表了这里四分之三以上人们的习惯思想”。德·雷纳尔先生所以没把给他戴绿帽子的妻子赶出家门，一个重要原因是怕失去她将继承的一大笔遗产。瓦尔诺为了发财，竟惨无人道地在被收容贫民的伙食账上“揩油”。老索雷尔利用一桩土地交易，暗中诈取市长一大笔款项；他为得到一笔钱，甚至乐意看到亲生儿子上断头台。于连在得到德·拉莫尔侯爵施舍的一万法郎年金和一份地产后，也不禁“欣喜若狂”。由此可见，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求已达到怎样疯狂的程度。

司丹达尔还描绘了笼罩在维里耶尔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指出由德·雷纳尔、瓦尔诺和玛斯隆形成的“三头政治”怎样“把持着奥

论”，“这种舆论是由一些傻瓜制造的，他们出于偶然，生来就高贵，富有，稳健。谁出名谁就倒霉！”他还指出，在维里耶尔这样的外省小城，生活单调乏味，“引起轰动的事少得可怜，所以一旦有了，就一定会传得沸沸扬扬”，弄得人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不是生活，而是在地狱中受煎熬。

司丹达尔对省城贝藏松的描写，基本上限于神学院生活，目的是集中笔墨，更深刻地揭露宗教的反动性和它对青年的摧残与麻痹作用。篇幅虽短，却被作者认为是“最精彩的部分”。

宗教历来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复辟王朝为了消除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勇气和斗志，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就极力向他们灌输宗教思想，引诱他们进入教门，脱离现实生活。在神学院里，老师教学生要“做教皇手中的一根棍子”，要他们遵照“听见就意味着服从”的原则行动，满足于“吃一顿好饭”，刻苦修行，并且用“你们将会得到绝好的职位，可以由你们指挥一切，不受任何控制”的谎言引诱和欺骗他们，以致许多学生终日卧病在床，“却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知识在这里一文不值”，统治阶级的目的，正如法国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巴尔代什所言，是“给权力当局培养言听计从的顺民”。学生不能有独立的思想，于连就因为“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从权威和榜样”，被视为大逆不道，因为他违背了“心灵的驯服便是一切”的教谕。

为了对学生分而治之，教会千方百计在他们中间制造矛盾和分裂，以致于连虽然门门功课名列第一，却整日处在大群敌人的包围之中，遭他们白眼、侮辱和谩骂。此外，“监视和告发在学生中受到鼓励”；学校当局检查学生的来往信件，暗中搜查他们的宿舍和行李（德·雷纳尔夫人写给于连的信几乎全被扣押，于连保留的阿芒达的地址被搜去）。

简言之，神学院是一所培养虚伪、歹毒、野心和堕落的理想学校，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于连的一段内心独白令人深思：“他们有朝一日会大权（教会天权——译者）在握；可是怎样的代价啊！”

外省如此，京城巴黎又怎样呢？

司丹达尔借助于连刚到巴黎不久的一句话，对此作了绝妙的回答：“我现在已置身于阴谋和伪善的中心。”

于连到巴黎后，很快便被带入德·拉莫尔侯爵、费尔瓦克元帅夫人和德·雷兹公爵的客厅。他在这里目睹的一切同样令人失望：京城原来是策划阴谋和分配利益的最佳场所。费尔瓦克元帅夫人通过她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叔父，掌着分配主教职位的大权；德·拉莫尔侯爵轻而易举地为皮拉尔神父弄到一个“绝好的教区”；瓦尔诺来此谋到了维里耶尔的市长宝座，随后又爬上省长的高津要职；于连也在这里为其父谋取维里耶尔贫民收容所所长的美差。正如皮拉尔神父所言：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依靠他们……在这样一个盛行交际的天地里，您若不能赢得尊重，那您就注定要遭殃。”

巴黎也像维里耶尔一样，处处充满阴谋活动，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外省小城远离权力中心，中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为一系列卑鄙龌龊的尔虞我诈；巴黎进行的阴谋活动则被贴上高级政治的标签，秘密会议是这种政治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会议的参加者无一不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他们策划于密室，共商乞求外国军事占领、以拯救查理十世的“大事”。德·拉莫尔侯爵看到了危险：“小资产阶级的二十万青年热衷于战争……在新闻自由和我们贵族的生存之间，有一场殊死的搏斗”，并号召贵族“拿起武器”。政府首相内瓦尔则疯狂叫嚣：“要么上断头台，要么在法国恢复君主制。”

巴黎青年贵族的精神面貌完全证实了司丹达尔所言，他们“丧失了强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他们内心惶恐不安，担心再次爆发革命，被送上断头台，“在每道树篱的后面，都看见一个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死囚车”。于是他们用其客厅的表面豪华，给自己制造贵族阶级依然强大的假象。流亡法国的秘鲁青年阿尔塔米拉道出了贵族社会的致命要害：“在你们的客厅里，思想遭人仇恨，它不能超过通俗歌剧里一段歌词的水平，这样它就会受到奖赏……凡是思想上有点价值的人，圣会就会把他们送上轻罪法庭，上流社会对此表示欢迎……”

巴黎的贵族青年整日生活在压抑和礼仪之中，“每个人的额头上都看得出烦闷的阴影”。他们是一批以讥笑他人为乐，终日无所事事